

《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

罗平汉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要:通过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之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如何使各项事业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尽管全面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十个方面的关系即十大矛盾,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其基调。中共八大通过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其中的反冒进观点与《论十大关系》没有直接的关联。在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更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1956年和1958年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运动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6)03-0027-13

Several Investigations on Mao's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LUO Ping-han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Histor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had been thinking about how to promote the greater, faster, better and mor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since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was accelerated through the movement of criticizing the so called Right-deviationist conservatism. Even though the speech of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alyzed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which were also called the ten major contradictions, that had to be well dealt with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general lin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greater, faster, better and more economic results was still the keynote. The opinion of anti aggressive in the economic guidelines of "both anti conservative and anti aggressive" passed by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had no direct association. On the problem of how to find out a roa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quicker and better than the Soviet, Mao's thinking in 1958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in 1956.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eneral lin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as just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thinking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greater, faster, better and more economic results.

Key words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greater, faster, better and more economic result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长期以来,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中,1956年常常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而毛泽东这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被认为是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奠

基之作,是“良好开端”的一个重要标志。可是,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运动扩大化,1958年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这种“良好的开端”为什么没有延续下来反而由此中断?

笔者以为,应当对《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地位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论十大关系》固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却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与《论十大关系》其实有着内在的关联,是《论十大关系》中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本文试图就此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论十大关系》形成前毛泽东“加快我国发展”的思想

1955 年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速度问题上,由于如何判断当时农村的形势着眼点不同,毛泽东与主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之间发生了分歧。邓子恢主张稳步发展,而毛泽东提出要加速发展,并由此导致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上如同“小脚女人”走路,不但自己走不快,还埋怨别人走快了,于是决定采取措施开展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先后于这年 5 月召开华东、中南、华北 15 省党委书记会议,7 月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0 月召开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这些会议的主题都是对“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批判。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进入高潮,根据不完整的统计,到 1955 年年底,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 190 多万个,比秋收以前的 65 万个增加了将近两倍;入社农户已经达到 7000 多万户,占总农户 60% 左右。这样,原计划需要 15 年才能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大大提前。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行,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也大大加快。进入 1956 年后,各地相继宣布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批判右倾保守后的迅速加速,促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在中国基本建立,要发挥这种先进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

又使他感到,既然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克服右倾保守思想,速度可比原计划大大加快,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是否也同样有右倾保守思想需要克服,是否可以同样加快发展速度?

1955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当然,我们一提出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从这许多事情看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①。他还说,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②。在毛泽东看来,党内普遍存在右倾保守思想,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各项建设事业上。

此前的 1955 年 9 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本书收集了一批各地办合作社的典型,毛泽东还为其中一些材料亲笔写下了按语。同年 12 月,毛泽东再次对这本书作了编辑,对书稿作了一些增删,随后交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毛泽东还分别在这年 9 月和 12 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他在第二次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农业合作化比原计划大大加快“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他还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70—471 页。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8 页。

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同各项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①

这就是说,毛泽东编辑这本书,固然希望就此进一步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引向深入,但更主要的,还是通过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右倾思想”的批判,解决工业、商业、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文化各项事业中他认为也存在的“右倾保守”问题,由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带动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高潮。从1955年夏批判所谓“小脚女人”起,毛泽东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表露出来,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又使他相信,早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是能够实现的,关键的问题是克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

按照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明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社论说,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突破了原来计划的指标向前猛进,这就给予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使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都加快发展。而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又要求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工作也加快发展。社论进而提出,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②。这篇社论中,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已经跃然纸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即将实现新

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新的社会制度即将建立,人们曾对这种新制度寄予无限的美好憧憬。然而,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并没有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迅速改变,要使新制度真正体现其优越性,就必须加快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速度,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而当时人们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将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因此,各项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发展速度又是可能的。

在农业合作化即将完成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农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成了毛泽东接下来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共在全国执政前,长期以农村作为革命的中心,广大干部对于农民相对比较了解,对农村工作似乎也比较得心应手,因而各项全国性的工作也习惯于先在农村展开。如同通过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带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一样,为了克服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毛泽东决定通过加快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来解决整个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1955年11月间,他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同华东、中南、华北14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十七条意见(简称“十七条”)。同时,他还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二篇序言中宣布:“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③

1956年1月,毛泽东又在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

^{①③}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人民日报》1956年1月12日。

^②《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

条,形成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四十条”。1 月 23 日,“农业四十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于 1 月 25 日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以草案的形式公开发表。“农业四十条”草案的中心,“就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①。并且要求在 12 年内,把粮食每亩的平均产量,提高一倍以上;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显著地收到水土保持的功效,基本上消灭水土冲刷的灾害;凡是有水源可以利用的地方,基本上做到每一个乡或者几个乡建设起一个小型的水力发电站;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等等。这些指标的提出,即便没有后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农业四十条”草案中提出的指标,许多也是在 12 年内难以完成的。这个纲要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迅速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倾向。

从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将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作为推进各项工作大发展的重要方式。1956 年 1 月 2 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专门讲到了反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一种是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快一些,好一些。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所以,就要反对右倾保守。这个右倾保守,现在是相当存在于各个方面。两种方法中间,我们不选择那种落后的、使事业办得坏的方法,而要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使事业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使我们的领导机关促进事业发展,使我们的上层建筑适合这个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②。毛泽东同时也提到,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时,应该注意不要搞那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认为各部门计划指标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本来可以做的不做,是不好的,但无充分根据的

行不通的就叫盲目性,就是“左”倾冒险。尽管如此,他认为盲目性当前还不是主要的倾向,在当前主要克服的是右倾保守思想。

这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又指出: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料,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③。

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目的,在于用通过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这样的方式,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在他看来,一旦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原来设想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建设中右倾保守思想一旦克服,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发展。同时,他感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④。但中国依然是一穷二白,在工业上、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改变,并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在

^①廖鲁言《关于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6 日。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第 513 页。

^{③④}《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 页。

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不相称。革命战争和社会改造取得的巨大成功,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他认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论十大关系》的基调

1955年11月7日起,刘少奇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逐一找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个别谈话。至1956年3月8日,共约谈了32个国家部委(包括国务院直属局)。这年1月12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随后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向他汇报工作时,偶然谈及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的汇报,此事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对薄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①于是,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总共听取了43天的汇报。

对于这次听取各个经济部门的汇报,被认为是毛泽东“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②。他自己后来也说:“那么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③就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中的—些重要关系开始进行归纳,同时也对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发表自己的看法。

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在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时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④。第二天在继续听取这几个部汇报时他又说: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知识分子问题也是这期间提出来的,干部也是知识分子问题,高级知识分子要搞一百万嘛。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⑤。

2月25日,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再次讲到发展速度问题。他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我们有可能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⑥。

4月19日,毛泽东将边听取汇报边思考的问题归纳为三个关系,提出三个关系都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他指出:真想建设内地,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⑦。

第二天,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了五个关系。他说:重工业是重点是无可争论的。但如果把轻工业建设投资比重定得不恰当,轻工业定低了,就是立志不想搞重工业。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除了轻工与重工,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⑧。

4月24日,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根据两个多月来听取经济工作部门汇报的情况,归纳了六大矛盾,即六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66页。

^{②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471页。

^{④⑤⑥⑦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31、532、537、562、563页。

大关系: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意在轻工业上多投些资。二、沿海与内地:为了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四、个人与集体:要发展集体利益就必须照顾个人利益。增加工人工资,正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农民中有两重关系,即国家与合作社,社与社员,必须照顾社员的收入能年年增加,才能提高社员增产的积极性。五、地方与中央: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六、少数民族与汉族:搞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汉族大有好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只占十四分之一,而土地却占百分之五六十。毛泽东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①。

就在毛泽东听取各个经济部门汇报之际,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闭幕前,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极大的震动。这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来。毫无疑问,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因此,如何以苏联为鉴,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建设道路,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1956年3月至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相继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一方面,赫鲁晓夫“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

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②。另一方面,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主要是不恰当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他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中国的教益,‘最重要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③。他表示,“这个问题几年前他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④。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但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使中共破除了对苏联的迷信,也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但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也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4月25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但“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⑤。这次会议毛泽东所讲的十大关系,是在24日他所归纳的六大关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一次对十大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并且着重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斯大林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犯人的改造问题等。

^{①②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66、550、557页。

^④吴冷西《回忆主席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第483页。

对于《论十大关系》基本思想,毛泽东在报告的开头就明确提出:“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经济、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①很显然,毛泽东之所以搞这一次调研并形成这样一个报告,就是试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如何加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而且毛泽东认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必将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而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揭露出来的问题,说明中国完全可以少走苏联曾走过的弯路,而走出一条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②毛泽东认为,只有把这十大关系即十个矛盾解决好了,中国就能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快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论十大关系》前五个关系,主要是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在论及各种关系时,其着眼点主要是如何加快发展速度的问题。例如,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报告肯定,过去在处理这方面关系上,没有犯多大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同时强调,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一是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毛泽东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③可见,毛泽东这里所考

虑的还是如何加快重工业发展的问题。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报告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过去朝鲜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可以更有力量来支持和发展内地工业。毛泽东说:“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④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认为,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几年的整训,军队加强了,装备也有所改进。今后如何发展,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发展。他说:“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⑤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报告提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①目前能看到《论十大关系》有两个版本,一是1965年作为中央文件发表的版本;一是1976年12月26日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是该版本。这两个版本内容有所不同,这一段话来自于1965年的版本。

^{②③④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2、25、26、26页。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 2 月 14 日在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时就说:“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3 月 2 日,他在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时又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①因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认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中国面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框得太死。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②。

由此可见,毛泽东这篇报告的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经跨进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如何避免苏联在建设问题上走过的弯路,加快中国经济发展,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中所论及的前五个是经济关系,后五个是政治关系,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正如他在报告最后所说的那样:“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的,消极的,直接的积极因素,间接的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③

三、《论十大关系》与中共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不少论著认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成为这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其中一条重要的依据,是刘少奇 1958 年 5 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说:“同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总的精神,就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把一切可用的

力量都调动起来,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④

《论十大关系》尽管涉及十个方面的问题或十大矛盾,但其重点无疑是前五大关系即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论述。对于中共八大与《论十大关系》之间的关联,不妨先看看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有关经济建设方针的表述。该决议指出: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必须正确地解决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布局问题。在内地和近海地区的关系上,既须继续把工业重点合理地移向内地,发展内地的经济事业,又须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近海地区的经济事业,特别是应当充分利用近海原有的工业基地来迅速推进内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既须发挥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又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须纠正地方经济事业中盲目发展的偏向,又须纠正对地方经济事业注意不够和限制过多的偏向。”“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⑤很显然,中共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这些基本指导思想,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可以说是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

但是,中共八大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既反对右倾保守、又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76—1949)》第 2 卷,第 528、540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1 页。

^③见 1965 年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论十大关系》。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0 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28 日。

反对急躁冒进,对此,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强调:“由于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由于我国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①反右倾保守是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前一再强调的主张,然而,综观《论十大关系》,几乎见不到毛泽东关于反对急躁冒进的表述。

实际上,毛泽东在形成《论十大关系》的时候,关注的重点恰恰是如何通过反对右倾保守加快发展速度的问题。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话。周恩来在传达中说:“上个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委书记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十个方针的问题。昨天,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又重复讲了这十条方针。这十条方针与政府工作有很大关系,所以现在要快一点作个传达。主席报告的总题目是‘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说,对于一切可用的力量、一切积极的因素,我们都要把它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还要把无用的化为有用,把消极的变成积极。主席讲的十条方针,就是十种关系,也是十种矛盾。就是说,我们要很好地处理这种关系、克服这种矛盾而前进。”^②整个传达中不见有反急躁冒进的内容。同年8月,朱德撰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其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朱德说:“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讲的十大关系问题,

关系到国内外的各个方面,是具体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方针和政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典范。把这十大关系、十大矛盾解决了,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③从周恩来的传达和朱德的文章看,毛泽东报告的主旨就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目的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其实,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之时关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恰恰是反对右倾保守。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由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共八大的指示。刘少奇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各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事业的进行还可以快,事情还可以多办。”“八大中心思想,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计划。”“要利用目前世界休战的时期,加快速度来完成我国的总任务。那时不论和战都好办得多。未完成而战困难更多。”“一切工作要求办得又多、又快、又好。”“以前反盲目冒进,反贪多、贪大、贪快,是对的,但出了毛病,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也反掉了。”^④据参与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做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⑤不论是毛泽东关于八大的指示,还是《论十大关系》,中心思想都是如何加快发展速度问题。这说明,至少在毛泽东发表《论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

^②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话的报告(节录)》,《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③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④《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6—408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第511页。

十大关系》之时,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关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论述上,只有反右倾保守而无反急躁冒进的内容。

然而,自从 1955 年夏天毛泽东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提出不但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而且也要加快整个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加快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规模和速度之后,经济建设领域急躁冒进的思想迅速抬头,国民经济比例有失调的危险,这引起了负责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从 1956 年春开始领导了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对于反冒进,毛泽东并不怎么认同。1956 年 4 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追加 20 亿的基本建设投资,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①胡乔木在其回忆中没有讲此次政治局会议的具体时间,查《毛泽东年谱(1949—1976)》,4 月下旬毛泽东多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4 月 22 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问题;4 月 25 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 月 26 日、27 日、28 日、29 日连续 4 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6 日的会议年谱上没有内容记载,27 日和 28 日的会议主持讨论文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29 日的会议年谱上无内容记载。因而暂时无法断定胡乔木提及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是哪一天,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毛泽东所考虑的仍是如何通过追加投资去加快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起草、经刘少奇审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发生了一种值得严重注意的新情况,这就是最近一个时期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

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不难看出,这篇社论提出的观点与毛泽东当时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社论表面上看,对急躁冒进和右倾保守两种观点都作了批评,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文章的重心是在强调反冒进。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的稿子交给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 3 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3 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②。

当然,尽管当时毛泽东并不赞成反冒进,但也没有对反冒进表示明确反对,正因为如此,在准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报告的起草者才将反冒进的思想写进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大会决议之中。据邓力群回忆:“1956 年 8 月中旬,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出来后,刘少奇请薄一波来提意见,一波同志来了以后,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加上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我们吸取一波同志的意见加上了,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③邓力群还说:“八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原来一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起草的,反对的就是右倾保守的倾向,到了陈云同志、周恩来同志提出,五六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才在八大报告中写进了反冒进的内容,到定稿时确定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这么一个方针。”^④可见,中共八大关于经济

^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9 页。

^②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3 页。

^③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6—67 页。

^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和主要内容的介绍——邓力群 1981 年 7 月 7 日、8 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教学参考资料》1981 年第 17 期。

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并非完全来自于《论十大关系》,其中的反冒进明显不是毛泽东的主张。

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除了在预备会作过讲话和发表了很短的开幕词外,并没有发表长篇讲话,而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他所讲到的还是如何加快发展、在不长的时间里超越美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①自从1955年批判所谓“小脚女人”之后,毛泽东始终强调的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而对于反冒进一直持保留态度。

四 《论十大关系》与“大跃进”的关联

人们常为1956年的“良好的开端”在1957年之后被中断而惋惜,也不理解为什么《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正确思想未能得以贯彻而被放弃。其实,从《论十大关系》到“大跃进”,就毛泽东本人而言,思想恰恰有其内在的关联,这就是他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因为如此,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后党内一些领导人倡导的反冒进,毛泽东并不赞同,而且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反冒进明显表现出不以为然。他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他还讲到保护干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提出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1月18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发言,其中讲到1956年的经济建设时,认为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主要表现在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30亿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陈云在讲话中着重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②。同一天,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发言,直接对1956年的反冒进作了批评。他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出来这么一股风^③。话语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意。

毛泽东对于反冒进的不满,经过1957年夏天的反右派运动后进一步发展。因为在反右派运动前的整风运动中,一些人曾对1956年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提出过批评,这就使得毛泽东看来,反冒进在先,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经济工作中存在急躁冒进,右派也说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因此,反冒进与右派进攻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

^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2、5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7页。

是有联系的。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①因此,在 1957 年 9 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措辞相当严厉的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并且强调“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就是在对反冒进的批评中一步步地发动起来的。

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论十大关系》中一项重要内容。尽管毛泽东认为要发挥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但他更多地是认为中央一些部门束缚了地方的手脚,侧重强调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58 年“大跃进”运动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工农业生产比例的失调,造成粮食产量 1959 年起连续几年下降,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认为农业问题已经过关,可以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于是在“大办工业”的口号之下,提出“两条腿走路”办工业,强调要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省、地、县、乡甚至农业合作社都大办工业,于是一窝蜂上马,一大批根本不具备条件的工矿企业特别是钢铁企业开工,从农村招收了大批的职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控。

《论十大关系》自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是他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作的重要思考,其中提出了许多不但在当时乃至时至今日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但是,也要看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如何走出一条与苏联相比更快捷的道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与他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完全一致的。1959 年底至 1960 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还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

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 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 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 1946 年选举演说,苏联在 1921 年产钢 400 多万吨,1940 年增加到 1800 万吨。20 年中增加了 1400 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②从《论十大关系》前后毛泽东的思想看,他其实就是试图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更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后来发动“大跃进”也是秉持这样的指导思想。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后者主要是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对于中共而言,苏共二十大更多是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迷信。尽管此后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但他考虑更多的是中共如何从苏联模式中走出来,尝试着找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 年 4 月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可以说就是这种尝试的最初努力,从这个角度看,说《论十大关系》是“良好开端”的重要标志不无道理。但是,又要看到,毛泽东此时试图要找到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其基本要义就是他《论十大关系》的基调“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表面看,“多快好省”既全面又辩证,但其侧重点无疑在于“多”与“快”,其目的就是用比苏联更短的时间,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迅速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出发点无疑是良好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多”与“快”,同时保证“好”与“省”。“多”与“快”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字指标衡量,而“好”与“省”则有很大的弹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侧重于“多”与“快”而忽视“好”与“省”。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9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7 页。

前文提到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之时,就提出要追加这年度的基本建设投资,结果未被中央政治局的多数人所接受。随后周恩来、陈云等人还开展了反冒进,也就是说,尽管当时领导层对《论十大关系》高度评价,但在具体实践中并没有立即贯彻“多快好省”方针,而是在既反右倾保守又反冒进的口号之下重点是反冒进,这正是后来毛泽东对反冒进不满的原因,因而作完《论十大关系》报告之后,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去了外地。至于中共八大在其政治报告及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强调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固然也经过了毛泽东的审阅同意,但反冒进并非毛泽东的本意。中共八大召开不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匈事件,促使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他一方面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①,所以不能忽视阶级斗争;同时他又认为,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有可能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甚至转化为敌我矛盾,因此他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为此于1957年2月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波匈事件发生时,国内也不平静,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要求退出农业合作社等事件,这也使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共干部中还有相当多的人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身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地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决定在中共内部开展整风运动以改进干部作风,这便是1957年春启动的整风运动。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场党内整风运动后来演变成反右派运动。所以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并没有过多地关注经济建设问题,也没有对反冒进明确提出异议。

到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认为,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运动中教育了全党和广大人民,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新的胜利,因而他重新将自己的关注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在

他看来,搞经济建设不但不能反冒进,而且就是要冒一点,就是要打破常规,破除迷信,这就必须进一步破除右倾保守思想,就是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如何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实现“多快好省”的发展,就成了毛泽东再度重点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此前的反冒进恰恰是与“多快好省”相违背、相对立的,因而从此时开始,他不断地对反冒进提出批评,强调要克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并在对反冒进的批判中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很显然,这条总路线与《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1958年的“大跃进”固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急于求成的一桩大实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但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并不是突如其来的,1955年下半年开展的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及由此而导致的1956年初建设领域的冒进,就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预演。这场冒进之所以未能持续,就在于周恩来、陈云等人领导了反冒进,也在于当时党内还保存有健康的民主生活,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已经认可了对于冒进的批评与否定,认可了反冒进。在他的思想深处,还是认为搞社会主义不能让右倾保守思想束缚手脚,就是要冒一点。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恰恰是在不断对反冒进的批评声中拉开序幕并走向高潮的,而“跃进”不过是冒进的另一种表述而已。由此可见,在快速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1956年和1958年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运动,并不是《论十大关系》所标志的“良好开端”的中断,而恰恰是其“多快好省”建设思想的具体实践。

作者简介:罗平汉(1963—),男,湖南安化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4页。